

大理古佚书钞

『三迤随笔』
『淮城夜语』
『叶榆稗史』

(明)李浩 著
(明)玉雷山人 著
(明)张继白 著

大理州文联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大理古佚书钞

《三迤随笔》(明)李 浩 著

《淮城夜语》(明)玉笛山人 著

《叶榆稗史》(明)张 继 白 著

大理州文联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理古佚书钞/尹明举主编;大理州文联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12

ISBN 7-222-03382-3

I. 大... II. ①尹...②大... III. 古佚书—汇编—
中国—明代 IV. Z4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599 号

责任编辑: 李惠铨

封面设计: 鞠洪深

大理古佚书钞

大理州文联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8 字数: 400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22-03382-3/K·316

定价: 36 元

序

李映德

这是三部已失传 430 多年的明代书稿,是三部关于大理古代历史文化佚而复得的珍贵资料,现经整理校注,汇编为《大理古佚书钞》一书出版。

时值世纪之交,一个偶然的机会,大理州文联的同志向我推荐了大理白族民间艺术家李苑先生贡献出来的一部手抄书稿,它抄录了明代永乐(公元 1403 ~ 1424 年)至嘉靖(公元 1522 ~ 1566 年)年间李浩著的《三迤随笔》、张继白著的《叶榆稗史》和玉笛山人著的《准城夜语》三部著作。据称,除《叶榆稗史》在明代曾有少量刻本在家族内流传外,其余两部均未刊印,仅是作者的手稿。经历过 430 多年的时代风雨,虽然有部分残缺,但大部内容经李苑先生重抄保存于世。我虽不是历史学家,甚至没有时间和精力把历史文化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但多年来主持一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岗位职务,要求我在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还必须尽可能地掌握地方的文史知识,特别是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作为一个民族干部更应当善于把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源来开发,变死宝为活宝,使之在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大凡有关大理历史文化的资料,那怕是一些线索,我都习以为常地要穷根究底,将其视之为必不可少的社会调查来倾心加以研究。

手捧近四十万字的手抄本,虽则句读不清,好多段落字迹模糊,加之毫无注释,但我终究还是克服各种困难,逐字逐句地将之全部读完。此书在经整理之初,尽管在文字上有些艰涩,但就其内容,则是越读越有兴趣。可以说,初读本书,给人的印象是内容十分庞杂,历史事件、南诏大理国宫廷内幕、民族源流、宗教信仰、天文地理、自然灾害、冶炼技术、医药卫生、文化教育、音乐美术,乃至民歌民谣,无所不包;从学术角度来看,又是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民族学、民间文学、民俗学乃至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都掺和在一起,令人真伪难辨。然而待到读完全书,掩卷而思,则使人从中真正感到大理各民族的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美丽、丰富、神奇。实际上,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多学科性。正是由于这种多学科性,才使它显得那么丰富多彩和瑰丽神奇。它像一座座蕴涵着珍贵宝藏和无数神秘的富矿一样,等待我们去发掘,提炼出光芒四射的民族文化精华。200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致“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座谈会”的信中指出:“我国西部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具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拥有大量文化瑰宝。”因而他强调要站在中华民族复兴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西部得天独厚的稀有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要重视涵养,加强抢救、保护和合理利用,建立良好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环境”。李岚清同志的这一指示也完全符合云南省和大理州的

实际,而且对于指导我们的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毫不犹豫地决定,尽快将这三部明代佚书整理出版,以提供历史文化界的广大学者和有识之士进行深入研究或在历史文化研究工作中参考借鉴。

众所周知,大理古代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剑川海门口青铜文化遗址作为云南文明之始至唐宋时期相继出现的南诏、大理国两代地方王朝,始终把华夏文明与边疆民族的土著文化交融整合,并广泛吸收周边国家的文化,形成独具魅力的中华民族区域性文化。这一部贯通中华数千年文明史又融汇了祖国云南边疆和西亚、南亚、东南亚文化的历史,使得大理成了人们公认的“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实物见证。然而,由于作为大理主体民族的白族历史上没有形成通行的文字,除了汉文典籍间接的记载就只有用汉字记录白语的方式记载自己的历史(至今人们还知道有其书名的尚有《白古通》、《玄峰年运志》以及各种碑刻),而为数不多的史料又于明代洪武初年被攻克大理的明军将领“以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篇,全付之一炬”。于是,自明、清以来,记载大理古代历史文化的专著仅存有诸如《蛮书》、《南诏野史》、《云南志略》、《大理行记》等几部屈指可数的史籍。此外,便是通史的记述和历代地方志书中的记载。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大批中原的学者来到大理,开创了对大理古代历史文化进行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的先河。特别是建国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重视下,先后多次对大理的古代历史文化进行普查、研究、考古发掘和文物修缮等工作,才使得大理刷新了“文献名邦”的金牌,赢得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美誉。

然而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所造成的困难却是不言而喻的。迄今为止,学术界找不到足够的史料写出一部内容充实的《大理国史》。在对诸多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中,还有着不少盲点或这样或那样的悬疑。在这种情况下,多发现一部古籍便是多一笔历史财富。何况这三部明代佚书的主要内容,记载的还是大理国时期的资料。据《三迤随笔》作者李浩自称,其史料来源多系明代尚存的名为“内史”和“段氏传灯录”的大理国宫廷档案,即便其他一些作者耳闻目睹的奇闻怪事,或道听途说的地方掌故、故事传说也是据今四、五百年前社会世象的记录,亦有相当的研究和参考价值,足见这三部明代佚书的弥足珍贵。

在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大州建设的进程中,学术文化界面临着一个全面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大理古代历史文化的任务。只有把此项工作深入下去,才能更完整地展示大理历史文化的悠久和博大精深,从而合理地开发利用,使之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贡献方面无愧于我们各民族的祖先。同时,也以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创造作为借鉴,不断创新,迎接挑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中赢得出奇制胜的有利地位。那么,面对这样三部思想内容极其庞杂的明代佚书,我们应当得到些什么有益的启示,并报之以什么态度呢,本人初步想到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作指导来加以分析研究,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消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特别不能忽视其在我们保持独有文化,继承特色文化,弘扬优秀文化工作中的参考借鉴作用。

第二、充分重视其史料价值,不断改进我们研究大理历史的方式方法。常识告诉我们,历史文化遗产的渠道和形成是多种多样的:有正史的记载,有野史的佐证,有民间口碑的流传,有神话传说的折光反映,等等。对大理历史文化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几部已经公认的汉文典籍的记载。而应当把视野扩大到广大民间流传的各种史料(包括文字的记载、口碑传说)和田野考古发掘的成果。有趣的是,这三部明代佚书中,不少篇什恰恰印证了当今考古发掘所得出的结论,如1996年省文物考古所与大理州文管所在今下关西南部苗圃山一带发掘了古代砖瓦窑八、九座,出土大量有字瓦和其他砖瓦,初步判断为南诏直至元明时期的砖瓦窑址。而《淮城夜语》中的《青木林万人冢》篇便明确记载了“南诏阁罗凤筑龙尾城,以青木林为取泥烧砖地”,青木林,即今下关西南片区的古称。此类与考古发掘相符之处,本书中比比皆是,不可能有那么多巧合。这正是这三部明代佚书的特殊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必须注重的問題。

第三,充分重视三部明代佚书的多学科性,不断扩大我们对大理古代文化研究的领域。毋庸讳言,过去我们对大理的研究,更多的局限于历史沿革、族属源流、宗教信仰等等,并往往因史料不足而产生无休止的争论,既难于深入下去,也无补于国计民生。从三部明代佚书所提供的多学科的资料来看,大理古代文化遗产是极其广博和丰富的。大到天文地理、外星来客,小到风俗习惯、奇人奇事,广至城邑变迁、王族更迭,深至民族心理、苦乐生死观念,各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的材料。这对我们不断扩大研究领域是个重要的启示,古人尚且能够从这么多的角度来

观察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我们更应当从当前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出发,对大理的古代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多学科的研究。

第四,至于对三部明代佚书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的问题,负责校注和编辑的同志已经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校勘工作。因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三部明代佚书,发现时已是当代人的手抄本,根本无法进行常规的版本或其科学技术鉴定,一切只能就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流传过程的客观性来加以判断。诚然,校注者也不可能绝对地打包票,但与当今流传于世的若干大理史籍相比较,这三部明代佚书的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而这种价值到底多高,则只有依赖于出版之后,广大学者专家来研究和评说,让实践作出结论吧!

面对新的世纪,让我们在继承并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塑造新的民族文化精神,激励各民族携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是以为序。

前 言

施立卓

《大理古佚书钞》汇编了经过整理校订的三部距今四百馀年的明代佚书,这是关于南诏大理国和白族历史文化的值得一读的奇书。它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新史料,描绘了一幅幅明代以前及明代洱海地区的社会生活的画卷,复原了那个历史时代闻所未闻的新鲜故事。

—

《大理古佚书钞》这一书名是编者拟定的,它汇编的《三迤随笔》、《叶榆稗史》、《淮城夜语》三部明代古佚书,成书于明永乐至嘉靖年间,这是明代的三部笔记小品的残抄本。各书作者的生平事迹今已不可详考,我们只能从书中略知一二。

《三迤随笔》成书于明永乐庚子年(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作者李浩在《自跋》中称:“余纓冑世家,自唐宋以来,多有册封,文韬武略十六代。”“余十七投笔,于定远军与义兄沐英有八拜之交,随高帝转战四方十八载。滇平,始成家,娶德胜驿(今大理下关镇)丞王义丈人女为室,屈指十九载。”“余自洪武壬戌(洪武十五

年,公元1382年)春入滇。事平,封疆于三迤道德胜关,为天威径镇抚使,隶属云南总兵西平侯沐英部下。”“自入滇以来,择以淮城(今下关)为德胜驿馆。修蒙氏龙尾关,历时五年。虽多次戍边征战,剿元军叛部于浪穹,平思任于麓川,皆靖剿小战。”作者在入滇以前,曾以“江南翰苑见闻而写《秦淮见闻录》、《从军录》”。由此可知,李浩是沐英入滇部队中的“中军录事”(文职军官),后来落籍于大理。

《叶榆稗史》的作者张继白,大理人。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余自幼生长于叶榆,幼与段宝(元代大理总管)共读于苍麓院。元亡后,无心功名,衣食无虑,志在寄情田野。闲观鹤舞,夜读百家著作,客来品茶夜话。话题之广,上至神通、辟地开天,中跨人王千年,下述鬼神玄怪,日久成集曰《叶榆稗史》。”他与李浩交情甚笃,结为姻亲。他还写道:“平滇事平后,李镇抚屯军德胜驿,与吾辈结为知交。”所谓“吾辈”者,指的是当时世称的“叶榆七子”,或“叶榆七隐”。他们就是志同道合的达果和尚(大理总管段隆的四子)、无极和尚、杨桂楼、张玄素、段宝姬(段功之女)和张继白等七位忘年交。据《淮城夜语》的作者介绍:“外祖公张继白有史官之志,怀才不遇,建山庄于古妙香国皇宫遗址。藏书之多冠于南中,著《叶榆稗史》四卷,增补二卷,刻版印书百部,多为宦海珍藏。虽为稗史,事皆事实。”

《淮城夜语》的作者署名“玉笛山人”,其真名叫李以恒,字静瑛,属李浩的后代,曾参与《赵州志》(未刊行)的修纂。明代庄诚修的《万历赵州志·儒学》中有载,说他是贡生。这里的淮城指的是下关附近的一座古废城,据书中记载:“西汉高祖吕后于未央宫斩淮阴侯韩信。韩信子女三人会部将于西洱河口,于青木林南建淮城。

二百年后毁于地震。”因有这种传说,自古下关有“淮城”的别称(也有写作“槐城”的)。

上述三部古佚书的资料来源,有其特殊的渠道。据书中记载,李浩随沐英进军大理,奉命与蓝玉接管大理段氏总管府,“蓝玉将军性暴,胡海兄好杀,段氏出逃免遭于害。城中火势大发,蓝玉部将占领四十饷库,全掳平章府珍宝。殿堂火发,余派人救灭,幸段氏藏书全存。余命五百战士,清理所存字画藏书,遍收得两百馀驮,驮至龙尾关,由余保存”。到了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李浩将这些藏书清理后,一部分解运南京,一部分交省城沐府,自己留下3000馀册。他在龙尾关辟地兴建一座叫“幽香阁”的书楼,珍藏这批段氏内府典籍。在《三迤随笔》的“自跋”中,他写道:“闲暇静观蒙段诸史于阁中,偶有心得,余以随笔记之,事久成集,故曰《三迤随笔》。”可见,这批宫廷档案就是这三本笔记小品的主要素材之一。另外,由于作者平时留心于街谈巷语的轶闻趣事,书中也记录了大量民间口碑、地方传说等。

二

现存的钞本已非全貌。据传,其中的《淮城夜语》原为16卷,分上下两册,共500馀则,现存者仅四分之一而已;原6卷本的《叶榆稗史》也仅存40馀则。然而,“观一斑可窥全豹”,这些残篇(约270篇)也属难得。

清代师荔扉在《滇系》一书中写道:明代沐英统治云南,推行焚书政策,“在官典籍,在野典章,悉付一炬,遂不可考”。由于有关史料的阙佚,南诏大理国执掌云南五百馀年的史实难辨。现存史籍

大多为后人所撰写,语焉不详,以致诸多问题一直扑朔迷离,给研究者带来不少疑难。《大理古佚书钞》汇编的三部明代古佚书的新发现,对于研究过去的那段历史,无疑是有一定价值的。

(一)涉及广泛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丰富的新史料

尽管三部古佚书系“不拘类别,有闻必录,长长短短,记叙随宜”的随笔式小品,显得随意和杂乱。然而,它所反映的大理乃至云南的历史是比较系统的,尤其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不同的篇章里作了不同侧面的记述。这些记述包括庄蹻开滇、白国渊源、武侯南征、天宝战争、苍山会盟、元灭大理、建文隐滇、洪武西征等等。对于其中的某些历史事件,比如庄蹻开滇是否有其人其事、诸葛亮南征是否来过大理、建文皇帝隐滇的真实性如何,现代史学界一直争议不休,有些问题似乎已成定论。然而不可否认,注重细节描写的三部古佚书中的资料,对于我们继续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从而得出更为确切的结论,不是没有启迪作用的。

天宝战争是南诏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过去《南诏德化碑》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史料。然而,三部古佚书笔记体的记述,却为我们展示了生动的战争画面。可能是作者居住地德胜关是天宝战争主战场的缘故,战争的阴影直至明代还未消失。三部古佚书对这场战争的记述篇幅因此最长,有近 30 则涉及这一历史事件,如《天宝轶事》、《万人冢坑》、《天宝南征战士冢》、《朱子贞》、《龙关太守》等,叙事生动,具体而详实。它记录下了战前形势、激战场面、唐军惨败原因,以及当政者以此为鉴的追思。最难得的是三部古佚书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如李浩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 1392 年)受命撰写的《重修万人冢天宝碑记》,以及历代官员和文士题咏战争的诗,其中有凤伽异的《归师曲》、大理国王段素

英的《天宝盛唐几春秋》诗、明代云南副总兵方政的《不谢梅江涛》诗、明代日本诗僧天祥的《悼李宓》等。在《韦安抚使与郑清平官》一则里还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料,即郑回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撰写了《万人冢碑》,其中结尾的文字是:“宓公之败罪于奸党,误信佞臣谗言而兴师。罪非李将军,皆杨氏所为。南诏深怀旧情,拾诸将士尸立冢二:一冢于西洱河口南岸清水潭,计三万人;一冢于青龙口,葬尸八千。将军躯按诏俗火化,由国师主持超度……人死魄散,将军有知,唐时有灵,告诫后人,谨慎用兵。”

南诏时期的建筑历来备受称道,崇圣寺三塔至今仍然巍立在苍山之麓就是南诏建筑水平的体现。南诏城镇建筑,尤其是王都的建筑由于早已毁圮,因此除唐代的《蛮书》和元初郭松年的《大理行记》中有简略记载外,史料阙如。三部古佚书对这方面的记载就显得详实得多了。三部古佚书载:“古白子都起建于河蛮部,分三部建三城:南部为太和城,中部居羊苴咩城,北部史赅城。”(《三迤随笔·叶榆城三变》)南诏入主洱海后先以太和城为王都,“城宽二里,长十里,削山崖为屏障,垒土为城,高丈六。外墙以石砌墙”。到了异牟寻,因地震火灾,太和城毁,“而建西都行宫于五台峰麓”的大厘城;并由郑回修大都于苍山神祠东,名叶榆。叶榆城又名大理城,“周十六里,为求永固,以砖砌高二丈四,东西各一门,南北各三门。环以护城河,宽深各丈二,可泄洪护城”。天宝战后,南诏益强,仿唐制建新王都,连叶榆和羊苴咩为一城,“南起碧玉溪,北上隐仙溪,东起洱海,西至苍山,方十里”。“城仿长安,分内、中、外三城。外称羊苴咩,中称叶榆城,内称王城。而蒙氏居王城,群臣兵马居叶榆城,而民集居于羊苴咩城,多以部族及诸匠人居之。”(《三迤随笔·山茶十八品》)《三迤随笔》中的《南诏建三楼》、《叶榆城诸

坊》，《叶榆稗史》中的《五华楼》等篇则对城内诸建筑布局作了详尽的描写，远比唐代樊绰的《蛮书》和元代郭松年的《大理行记》更为具体，表现了南诏王都的气派和繁荣程度。

大理国现存的史料不多，除《宋史》中不得要领的《大理国传》560多字简略记述外，就是明清时期野史的较为系统的记述。比较起来，三部古佚书的描写就具体和详细得多了。三部古佚书记载了诸多大理国大事，如段思平立国、与四邻亲和、开科取士、让位高氏等等，大理国历代国王中专篇予以记载的就有10多位，对这些国王的生平、爱好、学问、政绩、归宿等方面的描述远比《南诏野史》详实。比如《元史·信苴日传》有段兴智“献地图，请悉平诸部”的记载，语焉不详，但《三迤随笔·方輿图》记载就很详细：

《石火花录事簿》载：天定王降元，忽必烈厚待之。兀良合台与智交甚密。兴智藏有《大理国社稷方輿图卷》。保定皇帝段正明在位时，命都阐侯高升泰率八画师，历三年，登山攀崖，以图千幅，书绘大理国河山、方位、路程、毗连、人丁，皆绢轴，计四部。两藏内宫，一藏五华楼，一藏高相国府。元灭大理，天定王降，献图一部。至此，南中江山、社稷、人丁、部落，元帝历历在目。

三部古佚书中的《汉代叶榆传汉学》、《韦安抚使与郑清平官》、《叶榆城诸坊》、《南诏入学大理国沿之》、《段素英兴儒》、《段正兴辟马市》等篇，详细记载了古代云南与中原的关系，丰富了这方面的历史资料。

(二)提供了明代大理地区宗教信仰的不少史料

三部古佚书中记载的有关南诏至明初大理地区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道教。另外，也有一些本主崇拜的记载。

南诏大理国向以佛教为国教,国王至庶民均笃信密宗阿吒力。三部古佚书在多处详细地描绘了当时佛教流行的盛况。《三迤随笔·圣德皇帝高升泰事》记载:“段氏宫史载:段氏以佛佑得国,国人皆信佛。初一、十五,国中上至帝驃,下至臣民,皆素食。晨起入市献香,虔诚拜诸佛。大理崇圣寺、弘圣寺、观音阁、无为寺、罗荃寺、石云寺、圣源寺诸法师,皆寅时绕佛,辰时由诸大法师讲经。帝王听经于无为寺,诸臣听经于崇圣寺,其余诸寺为庶民听经所。时叶榆寂静,路少行人。至巳时而归始如常。”《三迤随笔》有《无为寺南诏高僧》、《蒙段诸异僧》,《淮城夜语》有《元末大理十大高僧》,详细记载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著名高僧,许多为过去的史籍所无。南诏大理国的僧侣大多为所谓能“撒豆成兵,草木化虎豹”的阿闍梨,他们被人们所神化。这些记载为南诏佛教的传入路线提供了研究史料。

大理国王竞相禅位为僧事是令人惊讶的奇特现象。对此,三部古佚书记载尤为详实。其禅位缘由及出家生活独特而有趣。关于禅位的原因,《三迤随笔》中的《后大理国一世段正淳》载:“余观段氏史籍,国中君主多出家为僧。段氏以佛立国,崇佛敬僧,国中大事高僧参与。国之灾祥祸福,皆前修今生因果。故有事难解,国中大事皆与在位皇帝有关。功过于帝,帝王失德或处多事,皆有语言涉帝,唯以出家则孽障可免去谴责。帝王出家与在在朝何异?除剃光了头,龙椅依旧,身披金线袈裟,执金钵盂吃饭,依然金盆洗脸,只是素食而已。余与段氏后人多往来,段居士曰:‘家族出家者都是失民心,不得人心,遭众论,出家一了百了。’”可见国王出家并非如常人想象的青灯黄卷、晨钟暮鼓式的枯燥单调。据载,随秉义皇帝段素隆出家,“军将十二,清平官七人,随从一千三百餘,皆受

戒落发”。保定皇帝段正明出家时，“分金一库，每外出必由随身沙弥以二十骡马满载金银”，而且“常携诸前妃游于宋朝诸名山”。《淮城夜语》中的《后理国王多为僧》载：“大理国民谚曰：‘帝王出家，随臣一帮，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

对于受佛教影响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火葬习俗，三部古佚书亦有较详细的记载。《叶榆旧说》载：

余入大理，很少见古坟墓。所有坟茔，皆元朝以后始行。问之，皆曰蒙氏国王墓于五印山崖洞。臣民死则以佛礼火化，以瓶置于地室。满五百而封闭之。地室皆山野之地，外人莫知。大理国亦沿旧习而藏骨灰，与僧侣同地室。盖南诏至大理国皆信佛，人之死为涅槃，信者可归极乐。即争战杀入众多者，死前悟善，死后火葬得佛经力，皆可由接引佛，为其在悔后魂登彼岸。人之死后，若抛尸于野，多成精，葬于土者为鬼魂，魂若尸骨在土曰“有舍”，有舍可轮回转世，周而复再生，生、病、苦，永受折磨。而佛子毁在火化，永不转世。而无尸舍永登极乐，去到彼岸，永不再来人间。

三部古佚书还记载了南诏大理国国王骨灰放置地，可惜沧海桑田，时代变迁，至今已了无踪迹。

三部古佚书作者还记述了南诏至明初在大理的异域僧人。《三迤随笔》中的《蒙段诸异僧》中就有维鸠摩诺诃、赞陀崛多、罗荃、韩陀崛多罗等梵僧事迹的记载。作者还描述了与明代日本诗僧天祥等人的交往，以及诗僧鲜为人知的生活和诗作。同书中《明初高僧喜寓大理》载：“自高帝平滇，汉人纷至，南中佳境始为汉人知。大理本福泽之地，崇佛敬道，供养八方来僧。中原众僧，闻讯